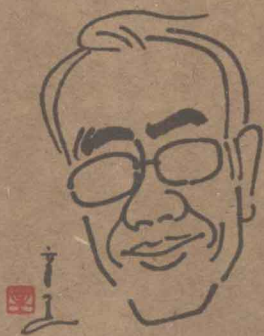


转型与使命

海上文化散论

管志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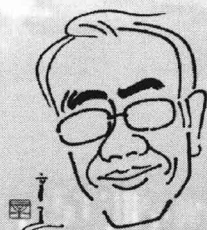


上海大学出版社

转型与使命

——海上文化散论

管志华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与使命：海上文化散论/管志华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 10

ISBN 978-7-5671-0405-1

I. ①转… II. ①管… III. ①地方文化-研究-上海
市 IV. ①G127. 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7636 号

责任编辑 焦贵平

封面设计 倪天辰

转型与使命——海上文化散论

管志华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江苏南洋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6.75 字数 239 千字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0405-1/G·923 定价：65.00 元

自序

有这样一个事实不容人们忽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迅速，致使传统的金字塔社会结构开始嬗变，其中间阶层（目前尚谈不上中产阶级）的相对比例也就有所增加，比如像在北京、上海大城市，出现“白领”职业群体人数超过“蓝领”职业群体人数。当然，从全国情况看，距离中产阶层占主体的社会还有很遥远的距离。

西方国家的更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国的更替是迅速发生的。因此，在西方国家，无论是老中产阶级还是新中产阶级，都是由各种年龄群体构成，而中国的老中间阶层是一个由40岁至50岁上下、近于同龄的群体构成，新中间阶层则由一个30岁上下（即80后、90后）的年轻群体构成。如果说是橄榄型社会结构，莫如说是哑铃型社会结构。在这样社会形态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形成、成长与壮大起来的新兴社会阶层，他们在社会转型中扮演了先驱者、引领者与催生者角色，发挥出重要作用。

时代嬗变，知识分子也在代际嬗替，其中有后一代对前一代的肯定与推崇，更有前一代视后一代为过于偏激、过于张扬，而后一代批评前一代落伍甚至有呼唤前一代退场的声音，对这样一个“合”与“分”、“同”与“异”的文化现象，值得当今知识界、学术界研究。

不能不指出的是，尽管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颇有先锋意识、前瞻思维，在资讯发达、通讯便捷的当下，他们有文化担当、直面现实精神，但基于商业社会商业因子活跃、渗透，使得当今知识分子的社会功用日益退化，知识分子追求知

识不再是他们探索真理的武器,而变成事业买卖的资本,他们有的失去了责任感、使命感,变成了追名逐利的商化人、庸俗人。有的为了个人的利益,投靠于政治集团或者利益集团,对腐败的社会恶习丧失了批评的勇气乃至批判的锋芒。

这与文化大有关联。文化是人格、良知、智慧、勇气,是内心真善美的表现。

上海作为海派文化的发源地,融合了吴越文化等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精华,吸纳、消化国外优秀文化因素,构建为崭新的富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海派文化,其特征表现为海纳百川、熔铸中西、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风气之先。同时还表现在不闭关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不排斥时尚;在吸纳的同时不照搬照抄,也不重复和模仿人家,而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它既是“拿来主义”,又是“改造主义”,呈多元、多样、宽容、善待的状态,有粗粝,有精致,有仿效,有特质,有甄别,有扬弃,在新老上海人眼里,可以“雅与俗”,可以“洋与中”,可以“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它的洋派带有本土气息,它的时尚带有中国特色。书中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责任和思考,从一个个知名学者、科学家、报人、出版家、导演、诗人、画家、篆刻家身上,我们看到一代知识分子精英的追求和情操,他们坚持真理、敢为人先、默默奉献的境界令人敬仰。这些汇集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中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及文化担当精神尤为重要,作者愿为祖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尽绵薄之力,仅以此本文化散论奉献大家。书中难免疏漏不足,望读者诸君见谅。

作 者

目 录

自 序	1
-----	---

思 想 飞 絮

灵魂的漂泊	1
知识分子“自由雁”	5
文士与文心	7
皇城根“子民”	11
民族的脊梁	14
礼乐和为政	23
颂圣文化	26
忧劳与亡身	32
今夜冬至	34
兔年杂感	37
雨夕夜窗	40
“文革”串联记	44
邓拓社长百年祭	49
怀念敬宜先生	54
[附录] 下辈子还做记者	61
尼采的“虚无”	64

霍金的“宇宙黑洞论”

68

书苑憩息

杂粮与杂书

72

纸质书·电子书

75

好书·好名·好读

77

张澜先生的“四勉一戒”

81

官治、吏治及民主

86

由《颜氏家训》想到

90

翁氏后代校订 重出“帝师”日记

92

王云五的三顶“头衔”

96

诗之遐想

98

漫谈小品和漫画

99

《中国旅游大辞典》诞生记

101

美学在人间

105

重温大师底蕴

108

行走于新闻和新闻史之间

112

心系大爱玉兰香

115

[附录] 女性成才的心路历程

119

海派追踪

松江：上海之根与文化名人之灵地

125

嘉定：“文化之圣”和“教化之邦”	136
青浦：上海远古文明之源	148
上海：走进中国共产党发祥地	157
上海红色旅游正盛时	160
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畅游申城新景观	164
陶行知旧居：默立历史风云	167
国宝熊猫“世博行”	170
重现衡山路历史风情	175
昔日十六铺 今朝有“欣景”	177
中华文化和“海洋女神”	179
如皋水绘园印象	183

闻人风华

科学精神照亮我的人生	
——记改革开放后首批赴美学者吴德炎	187
万里留学，撞击科学火花	
——记改革开放后首批赴美留学生沈绿萍	191
仰视一代电影导演谢晋	195
沉潜文学之海 隐身汉译之林	
——访法国文学翻译名家郝运	200
韩天衡：治印治学 书画书人	207
俞晓夫：油画是我的最爱	213

放怀天地外 得趣书屋间	
——访文化史学者、原燕山出版社总编辑赵珩	219
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关键转折	
——追忆访问黄兴的嫡孙黄与群	226
杏林名医王翹楚	234
乡野潜“龙”行天下	
——记昆山书法家金志坚	236
俞林虎：画虎赏石悟灵性	239
纵情诗画求其合	
——记女诗人、女记者成莫愁	241
献了青春献白发，为了江山为子孙	
——老干部五人访	245
为国际大都市添一道风情	
——记上海志愿者科技馆总队成立十周年	251
后 记	256

灵魂的漂泊

人有否灵魂,这是几千年来人们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在我看来,人的躯体存在总会有自己的灵魂——灵性,而随着肉身的消亡,灵魂亦就灭迹了。但中国人以为,人死亡后,其灵魂依然四处漂泊,于是就有神鬼说、超度论。在日本古代,也有一种“御灵信仰”:即死者,特别是政治上死于非命的人,死后常常现出某种怪异,给人们带来灾难,这种未被安慰的灵魂即称“御灵”,于是要为它们修盖专门的祖庙。这种“御灵信仰”在日本平安时代特别盛行。

英国有一个灵魂研究所,美国、日本也有,中国的社科院也有宗教研究所,名字不同,实质一样。英国这个研究所,给修行人(修道者)和不修的人做对比实验,研究发现实验对象死后脑电波非常平稳的都是有一定功夫、经常静坐的修行人。有实验结果,却无法解释脑电波不异常活动的原因。没有一定静坐功夫的人,他们的脑电波上下跳动,非常活跃。这样的人死时内心恐怖,心性散乱,业力苦逼,这是其一。其二,科学家通过暗室里安装多角度视频摄像头观察发现,在一片黑暗的暗室中,所有人毫无例外的死时都有一丝白光由体内射出,有的修行人光都从头顶射出,多数人是颈部以下的身体其他部位发出,脚部、腿部,各个部位都有,几秒钟时间,这道白光迅速穿透一切阻力,消失不见。这是什么?日本的研究报告就说了,这是人的灵魂。研究报告已经表明,人体内确实有一个东西存在,佛家叫“神识”,其他宗教则叫“灵魂”。

且不说这样的话题,我则是想讲讲知识分子的灵魂。老实说,比起前辈老知识分子,当今青年知识分子,大多人格双重、灵魂漂泊,能甘受清贫、耐得寂寞的恐怕少数,真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瘠者,兴许是“稀有人物”,或者更被人耻笑,诚如古人云:“人心世道,日趋于下,真可叹也!”

当然怪不得青年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受拜金主义、享受主义冲击,加上“文革”以前知识分子的受惊受压和“文革”以来知识阶层的断裂,薪火传承受阻,知识传递相隔,使得当今知识分子的自持、淡定、坚守的精神,再也不能与老一代学人相比。尽管时今青年知识分子高学历(不管这种高学历的学问底子如何)、高智商(不管这种智商的价值取向怎样),但未必有高能力、高品行,无怪乎有人嘲笑:“得学位者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而教书者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由于生活方式、生命形态不同,老一代知识分子渐渐“驾鹤西去”,若有在天之灵,他们惟有无奈叹息和苦笑。

记得北大著名教授游国恩先生说过:“人要有‘中气’,学问要有‘底气’,学问和人一样,有‘气’才能活。”此话确是说在道上,但我后来细想,现在知识分子的“气”用在玩耍上,用在门路上,用在造假上,说穿了是竞相争项目,钻进铜眼里,盯在钱袋上,毫无一个“正”字,一个“傲”字,从而变得人格低下,灵魂出窍,何有“气”矣,何有“神”也!知识分子素有“社会良知”、“时代书记”之称,而不是“笼中金丝鸟”、“屋内巧鹦鹉”。作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社会精英,他们有沉静、含蓄,有通悟、呐喊,有本色、感伤,有尖锐、泼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在中华民族振兴的漫漫征途中,上下求索,坚忍不拔,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可惜,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当今中国“缺席”了,或者说是“失哑”了。

倘若正确表达,当今知识分子灵魂正在漂泊,无有定所。这是一代的悲哀,是一代的痛楚,也是一代的麻木。其实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超常敏感的群体或个体,为一切不幸和痛苦感到震颤,经常领略灼烫、锥心的怜悯,如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所说:“只要存在着痛苦和不幸,快乐和幸福就不再可能。”而另一位思想家拉吉舍夫说得更透彻:“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相反,现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知识阶级一直沉浸或陶醉在“幸福指数”,从来没有“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打,敢骂”,对社会不公、分配不均、贪污腐败、欺上瞒下、官员霸道、平民受压以及医疗红包、教育资助、办事送礼等等,几乎不吭一声,更无拍案而起。尤其 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咸于改革”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躲进雅致的“象牙塔”,躲入自造的“蜗牛庐”,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社会地位、个人收入、情色享受,甚至以“智囊”、“顾问”身份为利益集团献计献策,分得一份美羹,而遗忘、漠视、旁观另一群被侵占、被损害、被遗弃、被贫困的底层群体,试问:如此知识分子的良知何在?如此灵魂漂泊变成天马行空,捞取自由买卖的筹码、本钱。

古谚说得好:“文人得志学孔孟,文人失意学老庄。”中国毕竟有几千年的文脉,现时知识分子的灵魂漂泊则是暂时的,不可能永恒。我以为,失去灵魂、漂泊灵魂的知识分子自然是少数,但害群之马的危害不可小觑,除了被正直、有气节的知识分子鄙视、唾弃外,未来知识分子的灵魂会得以矫正、回归。如果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真的知识分子大可不必去与假的知识分子较劲,“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倒不妨学点庄子“自然主义的超脱论”。

庄子的灵魂或许玄妙,然而其超脱生死却是一种豁达的生活哲学。在他眼里,人体与自然本是一体,出于自然,归于自然,无所谓生离死别,从而将小我化入宇宙的大我,达到无限,进而对人生持有一种淡泊无为的立场。庄子与惠施有过一场有趣有味的哲学争论,即“倏鱼出游从容”命题,两人的质疑异常风趣,庄子“知鱼乐”,实际上是物化心灵,他的灵魂自由实在,以此推理,面对山岳、林泉、飞鸟、云霓、苍穹……大自然的一切,都给庄子的灵魂装上翅膀,从远空,从高山,从大海,把自己的灵魂注入心底,由此落定伫立,恐怕比那些四处飞散的灵魂更快乐、更知足。

当代青年知识分子,不妨从庄子的快乐中明白点事理、悟到点启示,让自己的灵魂洁净、淡定,从而熠熠生辉,温暖人间。我想,绚烂是人生的追求,而平淡亦是人之福分。人的灵魂藏于躯体内,也可飞越天地外,但它是灵鸟,在飞达长空后须回返,否则无家可还,灵魂便会污染、肮脏,甚至变成一潭腥血。一个人的灵魂在于精气,而一个国家的灵魂在于文化。人若缺失灵魂,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国家没有灵魂,其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躯壳有甚意义?青年学子需要为生计奔波,但不可为挣钱失魂落魄,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我很真诚地呼吁,中国的知识分子,请你们考问下自己的灵魂,是不是丢失了?丢失了是否拾起?

千万不要忘记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不可像果戈理描写的“死魂灵”那样，把现有的中国现实改变成形形色色、贪婪愚昧的地主家园，腐化堕落的官吏天堂，以及悲惨处境的农奴地狱。

让自己的灵魂清醒，则需要珍视自己的精神生活，有时需要学会孤独沉思、甘于寂寞。孤独是人最好的伴侣，沉思是人最亲的友朋，它们无待于你的微笑、眼泪、赞美、讴歌，而你无待于它们的慰藉、抚爱、嗔怪、共鸣，在孤独中可获得宁静，在沉思中可享有遐想，这一切，尽在“无我”、“无待”中汲取与收获，如惠特曼德的诗句：“退到深藏着的隐避的地方，远离人群的喧闹，在那里深思冥想，度过快乐和幸福的时光。”可见，孤独并非一无是处，沉思其实并不吝啬，你的思想、灵魂在提升，能够进入全新境界。

基于我的人生经验，很想提醒青年学子：忙忙碌碌遂会使人心气浮躁，精神亢奋之后不免让人感到疲倦。人的心灵也许只有徜徉在一块静谧的芳草之地，一个闲适的绿洲之甸，方能获得一时半刻的轻松惬意。“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窍禄人”。生而为人，不能去做争利逐禄的蠹虫。人是需要看看鼻底下碗盆中的食料，摸摸口袋里的钱币，但有时也该看看头顶之上的星星和白云，关注身边周围的人间世界，更须回眸自己的心灵宇宙。一个人倘若遗忘或抛弃精神家园，失掉灵魂，一生劳碌，匆忙一世，岂不白白到人世走一遭？

但愿青年知识分子能与质朴率直的人相处，与民众融合，尽管在这扰攘的世间，那份清纯本色、那种人间挚爱似乎已成为“稀有元素”，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需要坚持，更加努力，人性之光，灵魂之辉，必将照亮神州大地。

知识分子“自由雁”

中国是一个“诗国”，无论诞生、延存、演变乃至毁灭，历朝历代总不会将诗人铲去。所谓“愤怒出诗人”，大抵是历经磨难、一番蹭蹬后就有忧国忧民的诗人群体出现。打个比喻，单个诗人仅是孤雁，一个流派便是雁阵，它们会完成自己的使命、表现出自己的壮举。

我始终把诗人划入知识分子范畴，不问学历、官衔，不计出身、地位，豪放抒情也罢，委婉吟唱也罢，简约叙事也罢，诗人是显性或隐性的“斗士”，将理想抱负、情怀胸襟一寓朗朗乃至沉沉的诗句之中，喷涌一股回肠荡气之风。

且举王令为例。也许今人不太熟悉，其实他是北宋著名的青年诗人，尽管他贫穷却不失志节，28岁因脚气病而过早谢世，但在十年青春中给人们留下70多篇散文和480余首诗，成就了他诸如《暑旱苦热》、《饿者行》、《暑热思风》等名篇诗章。王令的诗文后由其外孙吴说编为《广陵集》，虽未刊行，但近代始有嘉业堂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新版《王令集》，即据嘉业堂本校点，诗、赋、文共21卷；另有《拾遗》、《附录》、《年谱》等。

王令5岁时父母去世，由叔祖父王乙从原籍带到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抚养成人。诗人从十六七岁起就聚徒授学，开始独立生活，一生贫穷困苦，平日“衣衽履缺，终岁食不荤”，所以他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比较熟悉，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也看得相对透彻，“哀歌不入俗耳听，大笑自与万古期”（《秋兴》）、“却笑五松乔岳下，敢将直节事秦嬴”（《大松》），他的嬉笑怒骂透发一种性格、一种斗志，其诗格调高古，骨气苍老，多自出机杼，不屑依傍别人，诗风有的气势磅礴，有的冷僻尖峭，有的则偶涉恢谲诡怪。

诗人与王安石志同道合，交情甚笃，王安石不仅赞叹他的伟节高行，认为他

是可以与自己共功业于天下的人物,而且对他的诗也极为赏识,拔节于尘下,推崇于士林,还将堂房的妻妹吴氏嫁给他,所以当时王令的名气很大。不过,后来却寂寂无声。直至沉寂 820 余年,《王令集》终于问世。重读王令的诗文,也许能体味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所称士子即知识分子须具备“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人文境界。

我有所偏爱他的那首咏《雁》:“万里长为客,飞飞岂自由。情知稻粱急,莫近网罗求。关塞风高夜,江湖木落秋。哀鸣徒自切,谁谓尔悲愁!”诗人写的是雁,喻的是己。不是么,大雁万里为客,到处觅食,即使网罗在前也在所不顾。其实这哪里是它们自己愿意的呢?只不过非如此即难以生存罢了。然而它们的哀鸣,又有谁能够理解呢?掩卷思索,闭目静想,那只孤雁活活地浮现脑中。

不求功名的生活信念支撑着他,可经济上无所收获,却使王令陷入窘迫境地。他为养家糊口而四方奔走,饱受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渴望有朝一日“买田结归庐,种树屋四周。子居课桑蚕,我出鞭耕牛。教妻绩以筐,使儿饷东畴。坐笑忘岁时,聚首成白头”(《山阳思归书寄女兄》),但这仅是一场梦而已……

对比王令,当今知识分子的日子似乎好太多了。自然,过去曾有顶知识分子“臭老九”帽子带在头上,压得知识分子抬不起头,但脚底是实实的,心底是良知的,治学是严谨的,处世是真挚的;而今知识分子换了顶“金帽子”,除了老一代知识分子保持定力外,现在的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尤其娱乐界几乎上足发条忽悠起来,好像把持不住自己者居多,年轻的士子,脑袋盯着钱袋,眼带瞄着官带,“铁肩担道义”,那是别人的事;“纵论天下势”,这与自己无关——信与识两分离,即信仰变空,知识变松,学界务实主义乃为不游离现实却不持有纯粹的信仰,这不能不杞人忧天!

当然,有人用“金袋子”压知识分子“脑袋子”不属此例。某刊物的一位资深领导谈起一个沉重话题——因刊物为全面体制改革大声呼号,对人对事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敢于放真言、道真情,说实话、公道话,却面临“转制”问题,即有人利用机会,想通过组建股份公司以权力和票子控制大股东……这让我想起王令的那首咏《雁》,但愿这不是孤雁之鸣!

文士与文心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部著作、一位文士不能不谈到,即《文心雕龙》和刘勰。提起此,我不得不讲述一个真实故事:1966年“文革”肇始,我辈失学,在起先闹哄哄后又冷清清的学校里,除了一片红彤彤(插上一面面红旗帜、一只只红袖章、一条条红标语)、一片白茫茫(挂上一张张大字报、一顶顶白高帽、一根根禁区线)外,再也听不到琅琅读书声,看不到彬彬礼貌人。好在校内“保皇派”、“逍遥派”居多,虽有所谓历史问题、现行问题的教师被批斗、被侮辱、被迫害乃至被自杀,但老革命、老干部、老教师大多得到保护。

往事不堪回首。20世纪80年代后,经历过“上山下乡”、“四个面向”,到东北军垦农场、西双版纳橡胶丛林、外乡插队落户,包括到部队参军和在上海工厂的知识青年再次相见,发起所谓“难忘岁月,青春无悔”的聚会,我心里总有点抵触,什么“难忘”、什么“无悔”——这场民族、国家的灾难、浩劫本不该发生,按正常秩序,我们早该完成学业,或深造,或志业,或工作,或顶替,虽不能成为社会栋梁,至少能为家庭分担点力,休提了!

我则是讲我一个同事,到了青春期要谈恋爱,他家既非富翁,也非高干,属于殷实人家,找到一位漂亮的姑娘。很有意思,他俩悄悄地恋爱,不知怎么,有次姑娘问他读过《文心雕龙》么,他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后来他总算在图书馆查询到这本书,于是兴冲冲地找姑娘“拐浪头”(上海土语:即“露一手”显示自己),不料姑娘诘问:这个作者是谁?他答道:“刘思。”这就露馅了——原是读半边字的“别字先生”,胸无点墨,自此,姑娘与他“拜拜”了。他与我说起此事,我心里也是一惊,倘若遇上我也是同一下场,因为我同样不知这本书、也会读半边字。

这是“文革”带来的真实笑料,是尴尬的笑,含泪的笑,苦涩的笑,愚昧的

笑。后来我读了中文系,才知道这部《文心雕龙》是一部指导写作的书,也是一部谈论文学理论的书(近当代学者王运熙之语),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分量极重、不可或缺,而作者不叫刘思而应叫刘勰(xié)。现在静思细想,“文革”年代学苑折腾、学业荒芜,怪不得我那年轻同事,只能说是生错了时代,那时“知识越多越反动”,谁愿意戴这顶“臭帽子”?我猜想那位姑娘肯定是出生于文士——知识分子家庭,至少她是爱好读书的文学青年。尽管“文革”掐断中华文化的命脉,但“石在,火种不灭”,读书人香火传递,代代相传,不以官显,却以文彰。刘勰写作这部著作大概亦包含这层意思。

刘勰生活于南北朝,早孤而笃志好学,一生未曾婚娶。他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日照市),实际祖上避难南迁,居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大约二十五岁前后入定林寺,研习佛学却不曾出家。他虽身在庙宇,其实心存魏阙。他的人生理想是认为君子当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和才干,怀抱利器,一旦有机会,便施展才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这样的想法,代表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常有的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垂名不朽的思想,可谓士林的常态。由于近十年研习佛学,打下学问根底,加上他有感于当时文人追求新奇的心理太重、过分注重表面雕画、浮薄不正的文风,背离文章之本,刘勰的“文心”顿时勃发,借总结写作的基本法则,而不是好为人师、处处指斥时人,他著述《文心雕龙》予以深刻阐发,成就他在辞章领域中裁断众说、树立标准的圆通博大之作。

他在《序志》中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文心雕龙》是一部不朽的文学理论著作,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清代学者章学诚之语)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十卷、五十篇(原分上下部,各二十五篇),这里所说的是指开头的五篇《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变骚》,刘勰称它们为“文之枢纽”,也就是作文关键、纲举目张,其间道理细品才能体味。《文心雕龙》是庞大体系,且严密周全,于我而言,特别欣赏他“执正以驭奇,为情而造文”的思想。

刘勰非常重视文风之正,以“风骨”这一描述性的词语概括优良文风的特